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

CENTER FOR FUNDAMENTALS OF PHILOSOPHY, JILIN UNIVERSITY

网站首页

中心概况

中心新闻

学术信息

中心成果

学术交流

学术争鸣

English

您的当前位置: 首页 - 中心论文 - 提出和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重大理论问题

提出和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重大理论问题

作者: 孙正聿 时间: 2007-09-12 19:49:37 来自: 反思与奠基 阅读: 475人次

提出和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重大理论问题

——2006年《中国社会科学》若干哲学论文评论*

孙正聿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 需要提出和探索新的重大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 需要从“问题中的哲学”升华出“哲学中的问题”。“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与“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性”与“超越性”关系, 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的关系, 既是重大的“哲学中的问题”, 又是对我们时代的“问题中的哲学”的升华。探索“哲学中的问题”所蕴含的“问题中的哲学”应当是哲学研究的重要的方法论原则。

关键词: 新哲学 核心主题 超越性 哲学遗产

作者孙正聿, 1946年生, 哲学博士, 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教授(长春 130012)

一、新世界与新哲学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首要前提, 是准确地和深刻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这包括: 怎样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了哲学史上的伟大革命? 马克思主义开辟了什么样的哲学道路? 这条道路要求其后继者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

陈先达的文章(以下简称“陈文”)开宗明义, 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哲学的变革”, 又是“变革的哲学”; 它不仅重视“哲学中的问题”, 更重视“问题中的哲学”。这二个基本命题的概括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前者, 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革命的基本含义的概括; 后者, 则是对马克思主义开辟的哲学道路的根本性理解。也许正因如此, “陈文”的标题是《哲学中的问题与问题中的哲学》。

关于马克思的哲学革命, “陈文”明确提出, 马克思的“哲学的变革”, 源于他所创建的“变革的哲学”, 即: 马克思的哲学是为“变革现实资本主义, 为人类解放宗旨的需要而产生的哲学”, “为创立新的世界而奋斗的哲学”。在马克思这里, 创建“新哲学”, 与创立“新世界”是一致的; 更为准确地说, 创立“新世界”, 才是马克思创建“新哲学”的根据和目的。从创建“新世界”出发论述马克思的“哲学的变革”, 这是“陈文”探索马克思的“哲学的变革”的立足点和出发点。

在关于马克思的“哲学的变革”的论述中, “陈文”提出了三个层次的基本观点: 其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改变世界”的“世界观”, 而不是“为各门科学提供最终的解释权”的“哲学”, 这是新哲学与旧哲学的根本区别; 其二,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为创建“新世界”而奋斗的“另一种类型的哲学家”, 而不是以“解释世界”为目的的“经院哲学家”, 这是两种类型的哲学家的根本区别; 其三,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应该把哲学研究作为“参与实际活动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而不能“走经院哲学家的道路”, 这是两条哲学道路的根本区别。

在当代中国的哲学研究中,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传统哲学、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 长期以来存在两种倾向: 一是以从总体上否定传统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为前提, 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描述成离开人类文明发展大道的宗派主义; 二是以从总体上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世界观及其所开辟的哲学道路为前提, 把传统哲学或现代西方哲学视为哲学的“正路”。其中蕴含的一个重大问题, 就是“陈文”所提出的“哲学中的问题”与“问题中的哲学”及其相互关系。针对上述两种倾向, 以“陈文”所提出的这个重大问题为聚焦点, 有三个问题需要深入讨论。

第一, 如何看待“哲学中的问题”以及哲学家们对“哲学中的问题”的研究。

“哲学中的问题”作为“哲学研究范畴的问题”, 作为“真正形而上的问题”, 是“具有普遍性的哲学问题”。按照这种解释, “真正”的哲学研究, 就应当是对“哲学中的问题”的研究。如果应当这样看待“哲学中的问题”以及哲学家对“哲学中的问题”的研究, 那么, 就需要澄清下述几个问题: 其一, 充分肯定哲学史上中、外哲学家们关于“哲学中的问题”的研究工作及其所获得的成果, 而不是简单地以“经院哲学”之名而笼统地予以否定; 其二, 充分肯定这些研究成果所具有的独立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 并在相对独立的意义上继续相关的研究工作; 其三, 鼓励和引导当代中国的哲学工作者从“问题中的哲学”升华为“哲学中的问题”, 但并不排斥某些哲学工作者注重研究“哲学中的问题”, 专注于“真正形而上的问题”。“哲学中的问题”研究的重要性在于, 为我们从“问题中的哲学”升华为“哲学中的问题”, 并进而深化对“哲学中的问题”的研究, 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理论资源。这些理论资源是哲学家以哲学方式

打印全文



文字缩放



大



中



小

反思与奠基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
WWW.PFTHEORY.ORG

面向现实的基本前提。

第二，如何看待“问题中的哲学”以及哲学家们对“问题中的哲学”的研究。

关于“问题中的哲学”，“陈文”认为“这不是直接的哲学问题，而是形而下的问题，是需要哲学家从中捕捉的问题”。从当代中国的哲学研究的状况看，也存在两种倾向：一是“陈文”指出并深刻剖析的“重视哲学中的问题而轻视问题中的哲学”；二是缺乏应有的“哲学中的问题”的问题意识，缺乏应有的关于“哲学中的问题”的理论资源，因而造成同样值得关切的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即以研究“问题中的哲学”之名，实际上是在非哲学的层次上提出问题和分析问题。缺乏对“哲学中的问题”的真正的理论兴趣和艰苦的理论探索，在相当程度上阻滞了对“问题中的哲学”的拓展与深化。

第三，如何看待“哲学中的问题”与“问题中的哲学”的相互关系，以及与此相关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传统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相互关系。

“哲学中的问题”归根结底是源于“问题中的哲学”，因此，注重“哲学中的问题”的哲学家，只能在“历史视野”与“时代状况”的撞击中研究“哲学中的问题”，只能以自己时代的生存状况和生活体验为背景来研究“哲学中的问题”，而不可能是脱离时代的纯粹的玄思和遐想。哲学理论和哲学思维的时代性，对于我们理解“哲学中的问题”与“问题中的哲学”的相互关系，并由此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传统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相互关系，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其一，任何一种真正的哲学理论，从根本上说，都不可能是单纯地形成于“哲学中的问题”，而总是不同程度地形成于“问题中的哲学”，因此，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原则，应当是自觉地探索、澄明“哲学中的问题”所隐含的“问题中的哲学”。在何种程度上挖掘出“哲学中的问题”所隐含的“问题中的哲学”，才能在何种程度上把握到“哲学中的问题”。其二，正是由于“哲学中的问题”总是隐含着特定的“问题中的哲学”，因此，每个时代的哲学都具有某种广泛而深刻的一致性。如何以“哲学中的问题”与“问题中的哲学”来区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传统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是一个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其三，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原则性分歧，从根本上说，在于关注什么样的“问题中的哲学”，怎样关注“问题中的哲学”，以及如何回答“问题中的哲学”。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关注的“问题中的哲学”，是“变革现实资本主义”问题，是“人类解放”问题，是“创立新的世界”问题。这应当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原则区别，因而也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足点和出发点。

二、核心主题与核心命题

马克思所要创建的“新世界”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这不仅关系到对“新世界”的理解，而且关系到对“新哲学”的理解。叶汝贤的文章（以下简称“叶文”）从探索马克思的“核心主题”和《共产党宣言》关于未来社会即“新世界”的“核心命题”入手，讨论了“新世界”与“新哲学”的关系。“叶文”提出，马克思终生探索的“核心主题”就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而《共产党宣言》关于未来社会的“核心命题”，正是马克思的“核心主题”。

关于马克思终生探索的“核心主题”和《共产党宣言》的“核心命题”，“叶文”提出和探索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问题，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与“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究竟谁是谁的条件？这是一个关系到社会主义和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本质的问题，但又是一个长期以来理论界未予深入讨论的问题。这种状况既影响了对最根本的“哲学中的问题”即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研究，也影响了对最重大的“问题中的哲学”即社会主义本质的研究。“叶文”提出，“《宣言》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来界定社会主义，深刻地表明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从根本上把社会主义同一切旧社会区别开来”。对此，我深以为然。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个命题所内蕴的深刻的历史内涵在于，它表明了人在两种不同性质的“共同体”中的存在方式，以及两种不同性质的“共同体”所决定的人的发展状况。这两种不同性质的共同体，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虚假的共同体”与“真正的共同体”。社会主义是以“作为个人的个人”所构成的“真正的共同体”去代替“作为阶级的成员”的“虚假的共同体”。“虚假的共同体”是凌驾于个人之上的，因而不可能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而“真正的共同体”是个人发展的形式，个人是发展的主体，因而才能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并从而实现“一切人的自由发展”。

“叶文”对于深刻理解马克思的“核心主题”和《宣言》的“核心命题”，以及深入理解和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都富于启发性和建设性的意义。但是，无论是从“哲学中的问题”的角度，还是从“问题中的哲学”的角度，对于“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个“核心命题”、对于“以人为本”这个“核心理念”，学术界仍有广阔的理论探讨的空间。

从“哲学中的问题”看，究竟是什么样的理论困难阻碍我们对“每个人”与“一切人”的相互关系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为什么人们往往把“一切人的自由发展”视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而不是“把每个人的自由发展”视为“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是否需要重新理解和阐释“人”、“历史”、“社会”、“文化”、“发展”这些最基本的哲学范畴？在“每个人”与“一切人”的关系中，既包含着个人与个人、个人与共同体、个人与一切人的关系，也包含着个人与历史、个人与文化、个人的独立性与依存性等更为深层的矛盾关系。人作为历史的、文化的存在，总是被历史、文化所规范的，而“文化”的突出特征之一是它对个人的“偏离”，即以普遍性的方式“消解”其个性。在对历史的文化内涵的反思中，我们会更深刻地理解，为什么马克思提出“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在我看来，正是从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出发，马克思把他的哲学批判从“揭穿”“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转向“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深切地展开了他对“法”和“政治”的批判，也就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马克思的哲学批判，是要把“资本”的独立性和个性变成人的独立性和个性，也就是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这是马克思的“核心主题”的具体体现。

在当代诠释马克思的“核心主题”和《宣言》的“核心命题”，无法回避的最为重大的“问题”中的哲学是市场经济和现代化问题。市场经济并非仅仅是一种经济学意义上的资源配置方式，更是一种哲学意义上的人的存在方式。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人的存在的第二种历史形态，即“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存在方式。人的这种存在方式显示了自身的二重性：人从“依附性”的存在而实现了“独立性”的存在，然而，人的这种“独立性”又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以至于学者们以“物化的时代”来概括当代人的存在方式；人的真正的独立性即“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既要现实地超越“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生存状态，又必须以马克思所说的“第二大形态”所形成的“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为基础。同样，人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人的“一切社会关系”获得了现实性，但又造成了国内外学者在现代化的反省中所确认的人与他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自我的“疏离”。这表明，针对市场经济和现代化进程所产生的严峻问题而提出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就其所内蕴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而言，远不止是具体的政策性问题，而且包括既推进市场经济又超越市场经济、既推进现代化又反省现代化的哲学理念问题。由此，“问题中的哲学”就升华为“哲学中的问题”：我们现在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哲学理念？这是当代中国的根本性的价值选择和价值排序问题，因而也是当代中国的最根本的实践理念问题。

三、现实性与超越性

由“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个“核心主题”所展开的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具有真实的“现实性”，而且具有不容否认和不容忽视的“超越性”。那么，为什么“较长时间以来，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一直存在着这样一种强势的观念，即认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性质是现实的而非超越的”呢？这是张曙光的文章（以下简称“张文”）所提出和探索的问题。

从实践的观点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超越性，首先需要回答究竟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范畴。“张文”的最富启发性的观点在于，他认为马克思“把人类生存的永恒事实给予了历史性的理解，这种历史性的理解是现实的，也是超越的，因为它们就是人的历史性实践活动本身的两重性；这两重性既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而又能够相对地分化开来并呈现出极大的张力。所以，我们看到，当马克思以此为自己的思想方法展开其理论研究时，他的思想的运思，便一直在人们具体特殊的实践活动方式与人类生成发展的总体性的历史这两个向度之间反复展开；它不断地深入到人类历史的过去和未来之中，又从过去和未来返回到当下的历史境遇，从而不断地深化着对于人类命运问题，尤其是现代人命运问题的认识和解答”。在“张文”的这种解释中，“实践”已经不仅仅是某种被解释的对象，而且被升华为某种特殊的解释原则，即以实践的观点去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超越性。在我看来，实践观点作为解释原则，应当具有更为重大、更为基础和更为广泛的地位和作用——它应当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即：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以实践论的世界观去看待人与世界的关系，从而把人与世界的关系理解为否定性的统一关系。正是这种关系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性与超越性相统一的实践基础。

从实践的观点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超越性，还必须回答作为理论的哲学与实践之间究竟是何关系？在通常的解释中，总是把理论的功能归结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而理论之所以能够“指导”实践，则在于理论正确地反映了客观事物及其规律。在这种解释中，理论的根本特性就在于其“现实性”（正确地反映了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理论的根本功能则在于其“指导”作用（以合乎规律的认识指导人的实践活动）。应当说，正是由于仅仅把理论对实践的关系归结为“指导”作用，造成了“张文”所指认的那种普遍现象——只承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性，而否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超越性。

在对理论与实践的相互关系的理解中，最主要的问题是忽视甚至无视理论的批判功能，而这恰恰是作为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根本的特性。马克思一再强调，辩证法在本质上是批判的、革命的，他的理论是“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理论与实践的相互关系，不仅仅是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更为重要的是理论对实践的“批判”作用。伽达默尔在其《赞美理论》一文中突出地强调，“理论是实践的反义词”，“理论就是对实践的反驳”。理论作为实践的“反义词”，它对实践的关系，是一种否定性的统一关系，因而是对实践的“反驳”。这才是理论的最根本的“超越性”。

理论的这种“超越性”，从根本上说，仍然是源于理论自身的基础——实践——的超越性。实践作为人对世界的否定性的统一活动，它要把现实变为非现实，把非现实（理想）变为现实。这就是实践的目的性要求，也就是实践的超越性。源于实践的理论，集中地体现了实践的目的性、理想性要求，因而理论总是否定既有的实践，在对实践的“反驳”中把人类的实践活动推向新的领域和新的层次。

理论对实践的“反驳”，从根本上说，是对实践活动的价值排序，也就是对实践的“选优”活动。现代哲学的具有革命性的根本特征，就在于它从“层级性的追求”，转向了“顺序性选择”。在传统哲学的层级性追求中，作为理论的哲学，就成为“陈文”所指出的凌驾于科学之上的“永恒不变的抽象原则”；而在现代哲学的顺序性选择中，作为理论的哲学就构成了对实践的“反驳”，也就是以价值排序的方式对实践进行选择。“为创立新的世界而奋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为根本的出发点，对人们的诸种实践活动进行批判性的反思，并进而为实现这一“核心主题”的理想目标而作出最为合理的顺序性选择和安排。在我看来，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超越性”的最深层的依据。

四、重新解读与重新领悟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肯定“德国古典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直接理论来源”。但是，究竟何谓“德国古典哲学”？德国古典哲学之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实意义究竟是什么？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究竟如何“解读”德国古典哲学？这些具有重大意义的理论问题，虽然一直得到人们的关注，但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尚缺少令人信服和富于启发性的研究成果。俞吾金的文章（以下简称“俞文”）的出发点是：“对德国古典哲学遗产的重新解读将会导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的重新领悟”。通过“重新解读”德国古典哲

学遗产而“重新领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这个主旨本身就是重大的、深刻的，因而是一项长期的理论研究工作。

“俞文”的切入点是德国古典哲学“范围”的界定问题，具体言之，就是费尔巴哈哲学是否属于“德国古典哲学的问题”。“俞文”在考证和分析恩格斯的有关论述的基础上提出：“在恩格斯的语境中，德国古典哲学指称的是康德、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的哲学，费尔巴哈的哲学不包括在里面”。这个结论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者提出两个重大问题：其一，“既然费尔巴哈哲学不包括在德国古典哲学范畴中，那究竟如何准确评价费尔巴哈哲学在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形成发展中的历史作用呢？”其二，不包含费尔巴哈的德国古典哲学对于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新哲学的主要意义在哪里？究竟应该怎样概括和表述以德国古典哲学为主要理论来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这里首先讨论“如何准确评价费尔巴哈哲学在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形成中的历史作用”问题。“俞文”突出强调的是，“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并不是通向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路径”，在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历程中，并不存在着他接受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影响后，从对自然的研究转向对社会历史研究，或从唯物主义辩证法转向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用费尔巴哈式的唯物主义去改造和提升黑格尔式的辩证法是不可能的”，“在马克思自己的解释路径中，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作用并不是根本性的、决定性的”。

“俞文”的这些基本认识，对于深入探讨费尔巴哈与马克思恩格斯的关系，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问题：一是能否从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通向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二是能否从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而改造和提升黑格尔的辩证法，三是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对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新哲学是否具有根本性的、决定性的作用。显而易见，“俞文”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但是，究竟如何评价费尔巴哈的“历史作用”？这仍然是一个需要探讨的问题。

如果借用“俞文”的“后德国古典哲学”的提法来探讨费尔巴哈的“历史作用”，我们可以比较明确地讨论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理论问题，即：在从康德到黑格尔的“整个运动的完成”之后，“费尔巴哈哲学在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形成发展中的历史作用”究竟是什么？在我看来，恩格斯在他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已经给出了系统的、明确的回答。恩格斯提出，费尔巴哈“在好些方面是黑格尔哲学和我们观点之间的中间环节”，“在我们的狂飙时期，费尔巴哈给我们的影响比黑格尔以及任何其他哲学家都大”。那么，这个“中间环节”的“历史作用”是什么？为什么费尔巴哈比“任何其他哲学家”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影响“都大”？恩格斯认为，“作为从康德以来的整个运动的完成的哲学”，黑格尔哲学的真实意义和革命性，“在于全面彻底否定了关于人的思维和行为的一切结果具有最终性质的看法”。这应当是整个德国古典哲学的最根本的哲学意义。然而，“为什么彻底革命的思维方法竟产生了极其温和的政治结论”？这又应当是整个德国古典哲学的最根本的问题。正是从这个最根本的问题出发，恩格斯阐述了费尔巴哈哲学这个“中间环节”的“历史作用”。恩格斯指出，“在当时的理论的德国，有实践意义的首先是两种东西：宗教和政治”。正是“对现存宗教进行斗争的实践要求，把大批坚决的青年黑格尔分子推回到英国和法国的唯物主义”。恩格斯说，“这时，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出版了。它直截了当地使唯物主义重新登上宝座”，因而起到了巨大的“解放作用”，也就是它在马克思恩格斯“脱离”黑格尔哲学中的作用。

恩格斯在充分肯定费尔巴哈哲学的“解放作用”的同时，尖锐地提出一个问题，即：“费尔巴哈提供的强大推动力怎么能对他本人毫无结果呢？”恩格斯说，“理由很简单，因为费尔巴哈不能找到从他自己所极端憎恶的抽象王国通向活生生的现实世界的道路。他紧紧地抓住自然界和人；但是，在他那里，自然界和人只是空话。无论关于现实的自然界或关于现实的人，他都不能对我们说出任何确定的东西。”因此，我赞同“俞文”的这个观点：从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既不能直接走向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也不直接从黑格尔的辩证法走向马克思创立的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根基和内涵的辩证法。马克思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不是源于唯物主义的费尔巴哈哲学，反而是源于唯心主义的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哲学。这其中的奥妙就在于，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哲学，并不是超然世外的玄思和遐想，而是源于他们所处的时代的最重大的时代性问题。由此我们可以讨论，马克思在“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哲学中究竟汲取了什么？”

“俞文”认为，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哲学，引起马克思关注的主要有六个问题：“人”的问题，“市民社会”问题，“实践”问题，“自在之物”问题，“历史意识”问题和“自由”问题。毫无疑问，“俞文”所概括的正是德国古典哲学所面对的最为重大的“问题中的哲学”。但是，究竟如何看待马克思从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中所继承的辩证法的理论遗产，还是一个需要深入讨论的问题。“俞文”集中地在“历史意识”的“平台”上来论述马克思对德国古典哲学的辩证法思想的解读，这不仅是富有新意的，而且是触及实质的。在黑格尔看来，他所构建的内容与形式相统一的绝对精神的自我运动和自我认识的辩证法，并不是某种抽象的思维的自我运动，而是个体理性认同普遍理性的精神历程，是“全体的自由性”与“各个环节的必然性”的统一过程，因而个体实现自由的过程。这不是人们通常所解释的“概念辩证法”，而是以人类思想运动的逻辑而展现的人类寻求自由的逻辑，是一种在人类思想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历史意识”的内涵逻辑。马克思从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的辩证法思想中，最重要的是汲取了这种具有“历史意识”的内涵逻辑，并将其改造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内涵逻辑——以“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为其理论内涵的逻辑。这才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创建的本体论、认识论和辩证法“三者一致”的内涵逻辑，即作为历史的内涵逻辑的历史唯物主义。这种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具有丰富的历史内涵的辩证法。

探索“俞文”所讨论的马克思对德国古典哲学遗产的解读问题，给予我们的最重要的启示是，研究哲学，既需要切实地考证和分析“哲学中的问题”，更需要揭示“哲学中的问题”所隐含的“问题中的哲学”。

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哲学之所以能够为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提供丰富的理论资源，从根本上说，就在于德国古典哲学是“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就在于它以“最抽象”的形式表达了“最现实”的人类生存状况。抛开德国古典哲学所隐含的“问题中的哲学”，仅仅把它看成“哲学中的问题”，就不可能真正理解德国古典哲学及其真实意义。同样，作为“后德国古典哲学”的费尔巴哈哲学，它之所以能够对马克思恩格斯创立新哲学产生巨大的“解放作用”，就在于它引发了马克思恩格斯对“思想观念统治着现存世界”的西方主流思想的“颠覆性的破除”。“俞文”的重要价值在于，它实质上是揭示了德国古典哲学所隐含的“问题中的哲学”，并进而论证了德国古典哲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实意义。不仅仅是从“问题中的哲学”升华为“哲学中的问题”，而且从“哲学中的问题”揭示出“问题中的哲学”，这应当是哲学研究、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要的方法论原则。

[本文责任编辑：柯锦华]

[返回首页](#)

上一篇：[辩证法：黑格尔、马克思与后形而上学](#)

下一篇：[以哲学的工作方式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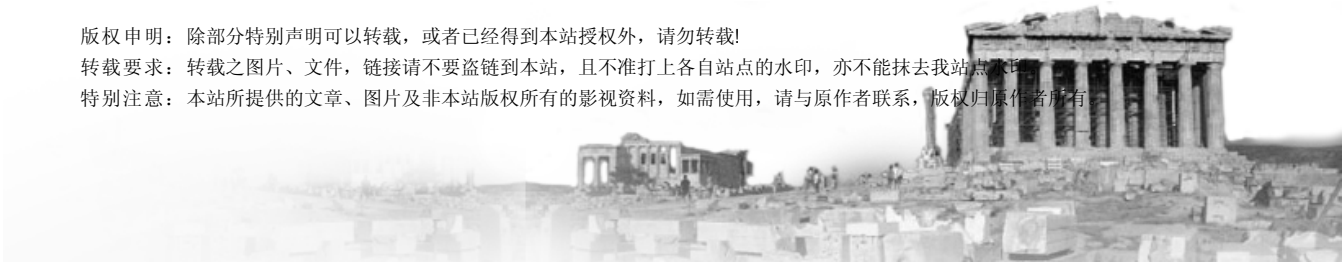
相关文章列表

- ★ [黑格尔的“历史和逻辑统一”是如何可能的——黑格尔历史原理的案例研究](#)
- ★ [黑格尔历史原理的“显白教诲”——黑格尔与马克思历史观的关系](#)
- ★ [黑格尔历史原理的“隐微教诲”](#)
- ★ [历史性的辩证法与辩证法的历史性](#)
- ★ [价值理想的当代重建](#)
- ★ [寻找时代的精神家园——重塑哲学的自然存在论根基](#)
- ★ [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法或作为辩证法的历史唯物主义](#)
- ★ [我们需要一场医疗观念的革命——关于文化医学与物种医学的思考](#)

版权申明：除部分特别声明可以转载，或者已经得到本站授权外，请勿转载!

转载要求：转载之图片、文件，链接请不要盗链到本站，且不准打上各自站点的水印，亦不能抹去我站点水印。

特别注意：本站所提供的文章、图片及非本站版权所有的影视资料，如需使用，请与原作者联系，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办公电话：0431-85166363 传真：0431-85166363 Email: qfwang@jlu.edu.cn 地址：长春市前进大街2699号 邮编：130012

© Copyright 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 版权所有 悉陀喻艺 提供技术支持 吉ICP备05555555号 管理